

盐蚀的瘢痕

——罗淑《井工》中的躯体伤痕与精神异化书写

曹雨瑞

内容提要：罗淑的小说《井工》生动地重现了20世纪30年代川南盐业的生产面貌，更以其所特有的细腻沉郁的笔调描摹出盐场工业化进程中个体的生存境遇。罗淑对盐工的躯体伤痕与精神挣扎、异化进行书写，构成她对旧社会工业化野蛮性的文学批判，也使她的盐业书写成为透视普通劳工命运的精神切片。在现代文学史上，罗淑以独特的盐场叙事留下了极具辨识度的文学坐标。

关键词：罗淑；盐场小说；《井工》

20世纪30年代，四川自贡仍是全国井盐核心区，供应全国五分之一人口用盐，井盐遍销川、滇、黔、湘、鄂等省。盐业作为四川自贡的支柱产业之一，具备从凿井、制盐到运输的完整产业链，足以吸纳数万劳动力，形成了规模性的盐场生产空间。作为首次正面书写四川盐业题材的作家，罗淑的创作具有开创之功。李健吾对罗淑盐业小说的开创性给予了肯定：

“特别是那些关于盐厂的断片小说，把一个我从来不曾结识的世界展给我看，似乎还没有第二个作家注意这个偏僻角落……”^[1]反映四川盐业的“断片小说”正是罗淑从独特的生活经历中发展得来，虽然片段式的书写无法鸟瞰式地还原当时四川盐业的宏观图景，但正是这些小碎篇章，凸显出她创作的细腻生动，亦能在宏大的盐业文化与工业进程下，用微观叙事烛照盐工个体的精神脉络与生命褶皱。

一、躯体伤痕图景下的盐场伦理揭示

在《井工》开篇，四周的环境万籁俱静，“然而丁厂并没有困过去呵！撑支着丁厂命脉的源泉——盐灶和盐井，正不断地，反而更加紧的在滋浸着”^[2]。即使万物休寂，丁厂里的工人仍然不能停歇，因为他们要维持盐井的持续运作。这些盐工都是失地或者破产的农民，虽然劳动方式有所改变，不再需要耕田犁地，但是生活、劳动的空间仍然处于乡村的范围。虽然盐业在川南地区已有悠久历史，但20世纪30年代，四川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仍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及其他工业城市，这种盐灶经营仍然保留着许多传统手工业

的封闭性、封建性，同时又掺杂着现代资本经济的剥削性与压榨性。长时间的过度劳动榨干了盐工们的生命力，“他们说话的力量都给什么压榨完了”^[3]。对于盐工而言，唯一值得期盼的便是别的伙伴来换班，这样自己便可以回到稻草做的地铺上，一觉睡到天明。

在这黑暗压抑的沉闷环境中，罗淑特别写到了一处场景：“空铺的正对面，躺着只病瘫的老牛，它患了下痢，不时把脏水排泄到地上。它的呼吸粗暴，骤急。常常抬起红胀得几乎要脱眶而出的眼珠望望人，又望望灯光，似有所希冀又似有所依恋；但是人除了对于由它身上发出的恶臭感到极端的憎恶以外，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4]这只病牛的处境固然可怖，但盐工们的生存环境也并没有更好，盐工老瓜“躺到地铺上。他不久打起呼鼾来，鼾声和病牛的喘息互相应和着”^[5]。此时，病牛的喘息与老瓜的鼾声形成了呼吸共振，病牛腥臭的排泄物和老瓜的身体亦构成躯体伤痕的呼应，因此病牛可以视为老瓜身体的同义替换、物理显现。牛作为已被驯化的家养动物，不再是那些草原上、原始森林中“兽性”十足的野生动物，正如老瓜失去了“山野孩子的本性”^[6]，在盐场这一生产性空间背景下，牛与老瓜的身体皆不再作为本真自然意义的生命体存在，而是成为资本机器解域下的纯粹劳动力载体。盐卤的蒸汽与病牛周边的秽气共同形成了腐蚀性的氛围，不断将鲜活的生命消解成为无意义的劳动材料。

但病牛不仅仅只指代着老瓜，还指代着老瓜的父

亲。老瓜在躺下后，梦见“他正捧了一碗鲜美的牛肉汤在大嚼，不知怎末一变……再一转眼棺材又是一只大黄牛，凶猛地向他直追”^[7]。老瓜的父亲正如这病牛一般，在盐场里竭力劳作，做了二十年的老灶工，却在一个起大风的夜晚因为到盐锅边上添水，煤烟和蒸汽使他的眼睛模糊，于是失脚跌下滚腾着白色溶液的盐锅中，不幸离世。老瓜为了让双目失明的老母亲吃上一口肉，将盐场管事埋在土里的老黄牛挖出来，在牛腿上挖走一大块肉煮给母亲吃，但这样的行径引起了管事的鄙夷和怒骂：“你在做梦，把你吃！这牛是老牛，拖了二十年的车，有功劳，我把它当人待……你懂你犯的什么罪吗？”^[8]在管事的眼中，老黄牛就像人一样，于是得以安葬，但老瓜的父亲作为真正的人，却连遗体都无从寻觅。管事对老黄牛进行仪式化的埋葬，更加凸显老瓜父亲死亡的无意义，他的死亡不需要盐场给出任何补偿，成为可被随意处置的赤裸生命。于此，通过动物的拟人化与人的物化，小说构建起充满讽刺意味的生命倒置。死去的黄牛有二十年的功劳，但老瓜父亲的功劳却被一笔带过，盐场伦理的建构充满了荒诞性，这种荒诞性因老瓜偷食牛肉的“卑贱”行为得以揭示。在这具有双重隐喻意义的“动物一人”的叙事中，牛成为测量人性限度的符号载体，兽性与人性的对立转化也隐匿在这荒谬的盐场伦理之中。

二、盐场精神异化秩序下的主体追寻

盐场的昼夜颠倒与围笼式的生活轨迹不断试图在潜移默化中异化盐工们的精神。老瓜的本名是梧子，“梧”作为一种生命力顽强的嘉木，蕴含着老瓜本初生命形态的自然性，也承载着乡土生命诗学的美好期许。但梧子在弟弟死后，被赐名“老瓜”，“这名字的意义是无力，是懦弱，甚至是憨痴，更由这而来的是讪笑，是揶揄”^[9]。作为生命意义的原初符号，老瓜这一名字在嘲弄中充斥着对其生命的轻视与忽略。这是一场对死亡冷漠的凝视与嘲讽，将老瓜与弟弟的悲剧转换成为一场“取名狂欢”，于此，盐场实现了对老瓜的主体性的第一次解构与抹除，在命名秩序中实现了对他的压迫，建构起他者的符号枷锁。

老瓜的父亲掉进盐锅去世以后，老瓜便被母亲送进盐场，他可悲的社会性存在是对父亲悲剧的伦理继承。“他成了小工人。他也和别的许多生活在丁厂周围的若干人一样，无论怎么总免不掉要吃这碗‘咸水

饭’，逃也逃不脱！”^[10]当死亡沦为生产链条上的器质的交接仪式时，老瓜被迫承受的不仅是生物伦理意义上的丧父，更是旧社会对他的阉割仪式，试图阉割其“自然之子”的生命力。在盐场这个环形封闭的时空范围内，老瓜就“像一颗生长在山野的植物……被搬到没阳光、没温暖，冷气阴森的暗室去”^[11]，失去了自己作为山野孩子的本性。他每天替别人汲盐水，每月从管事的手里领取一元的工资，每天吃三顿盐泡菜下饭。这样精确的生存计算，将老瓜的生命价值物化为工业计量下的一串数字，毫无生气地展示出对人性价值的掠夺。

但盐场的身体压迫与精神规训并没有完全压抑住个体的主体意识。正是父亲之死带来的交替仪式与伦理暴力，激发了他最初的怀疑意识，他第一次感受到自我和他者的区别。虽然“老瓜一直是这样地生活了下来。但又像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于是老瓜的脸色变得更白了。老瓜的头也仿佛更长。老瓜走起路更是一飘一飘的像一个阴影”^[12]。老瓜的灵魂似乎逐渐抽离出躯体，这样的抗拒姿态暗示着主体与既定盐场伦理秩序之间的认识裂缝。

老瓜终于决定辞工。他在众人的口中一直是懦弱的存在，但细究他的心理，可以看到他始终有反抗的意识，不管是脚踢病牛以示对盐场恶劣条件和自己残躯病体结局的抗议，还是用偷食死牛肉的行为喊出对盐工尊严的诉求，都是他用自己理解的行为方式去实现对盐场秩序的抗议。但他的反抗又是无力而孱弱的。在他决定放走盐船以报复盐场后，他想到“娘会哭的呵！——她吃什么呢……”^[13]老瓜在此时感受到了道德的拉扯。丁管事要将老瓜的母亲关起来等他来自首，但他的母亲却思量着被关起来以后可以白吃白喝，“管事先生忽然像受了侮辱般，足头踢了梧子一下，怒吼着说：‘滚你的，你连受扣押的资格都没有……你们一家子……’”^[14]老瓜的反抗，换来的是更加深沉的鄙夷与无视，并没有得到他所预想的注视与尊重，反抗显而易见地失败了。即便如此，罗淑在关照老瓜的精神书写时，氤氲其中的精神追问仍可以被认为是伤痕叙事表面之下的追索之钥。老瓜对盐场伦理秩序的怀疑与打破、对传统生死观念的原初式坚守、对主体尊严与存在价值的寻回，都让文本对盐场生产封建剥削性的书写成为后置性背景，闪烁着罗淑对现代社会运转发展理想秩序的思索，以及对个体主体精神发扬的人文关怀。

三、罗淑的叙事抉择：个体创伤与时代镜像

在“五四”前后的工人书写浪潮中，可以发现知识分子们在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书写工人生存境况时，“一是认定劳工之为人，不应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遂造成描写劳工悲惨生活的浪潮；二是认定劳工之为人，虽地位卑下，但有着高贵的人的品质，出现了某些表现劳工品质的作品”^[15]。至20世纪30年代，由于民族工业的短暂繁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工人境况产生若干变化，产业工人数量增加的同时，工人阶级受到资本的压迫也更加深重，左翼文学开始从阶级角度把握工人的命运书写，因此，此时的工人文学，不仅展示其被压迫的悲惨处境，还表现其力量壮大之后的斗争。但罗淑对川南盐场的工人境况的书写既不同于20年代对劳工光辉品质的书写，也不同于30年代对工人遭受压迫之后奋起抵抗的书写，而是在关注工人悲苦生活的同时，深度挖掘其精神异化的悲剧根源，以及展现工人对压迫的一种孱弱抵抗。

罗淑笔下的盐工并不是圣洁而又伟大的，他们有着启蒙叙事中一些普通农民的无知、愚昧的特征，但在这种书写之上，罗淑同样注意到了这些劳工在精神上的主体伦理追问和反抗精神的觉醒，透过这些劳工精神的变异和呈现，她的小说折射出的是一个社会的变迁。漫长的乡土秩序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变化，深处祖国腹地的四川亦是如此，资本主义的渗入使这里几千年来形成的封建秩序逐渐土崩瓦解，个体观念也随着时代历史的变迁而起伏。传统封建道德中的生死观是“死者为大”“入土为安”，“死无全尸”在传统文化语境下是一种具有极端惩罚意义的死亡方式。老瓜的父亲在盐场兢兢业业劳作二十年，逝世后不如拉车二十年的老黄牛能落得安葬；老瓜的弟弟竭尽全力地生存着，却“像被主人抛弃了的野狗似的死在人家屋侧的稻草堆上了。那里落了雪，好在并不大，只菲薄的、晶莹的一层作了他的寿衣”^[16]。弟弟死后，众人询问老瓜要如何安置弟弟，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归宿就是“入土为安”。这是他父亲没有达到的终点，是老黄牛作为“工人”有了“二十年功绩”才能有的落处。但这样的回答却引起了众人耻笑：“不埋他到土里还埋他到云里么！”^[17]对于盐场众人而言，埋进土里是理所当然，但是于老瓜而言，能够埋到土里便是人之为人的体现，并不是所有人死去都能够被埋葬。众人对安葬仪式的认知与老瓜不同，由此实现了

高位者对低位者的戏谑与调侃。盐工群体死亡观的嬗变是对传统死亡观的消解，老瓜作为盐工群体中“最蠢笨”的代表，却意外地保留了尤为珍贵的传统文化良质。

川南盐工生存状态以及复杂矛盾心理，并非罗淑“写”出来的，而是她于过往经历中所真实“看”到、“听”到以及“体验”到的。在这里，罗淑亲眼见证了许多盐井工人在咫尺空间内的悲惨生活。“罗胡子的幺女娃子（指罗淑）留洋回国后曾多次写信，要她的父亲把盐灶房的工匠待承好些，还劝说她的父亲和哥哥将灶房施舍给穷人。”^[18]罗淑对盐井工人的怜悯与关照并不止于书写，对剥削压迫的批判锋芒也超越性地指向了自身所在的阶级，正如鲁迅所言，“憎恶这熟悉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在现代文学发展的初期，阶级斗争的客观要求促使许多作家背叛自身阶级，毅然选择与广大劳动群众站在一起，罗淑笔下关于盐场的血泪文字，都是这一文学现象的经典表征，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义无反顾走向人民的清晰足迹。

结语

在现代文学史上，罗淑以独特的盐场叙事留下了极具辨识度的文学坐标。当她聚焦个体在乡土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秩序双重压迫下的微观命运，细腻地书写盐工们的觉醒与挣扎、异化与沉沦时，这不仅是对特定历史阶段社会阵痛的记录，更是对现代性发展伦理的持续探索。当读者凝视这些“精神切片”时，依然能够穿越时间与地域的限制，感受到作家对普通劳动者细致深刻的人文关怀，以及对社会进程背景下人性异化的寓言式提醒。

[1] 李健吾.记罗淑 [M] // 罗淑.罗淑选集.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08: 162.

[2][3][4][5][6][7][8][9][10][11][12][13][14][16][17] 罗淑.生人妻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35, 35, 37, 37, 43, 38, 42, 43, 43, 43, 44, 50, 51, 44, 45.

[15] 张鸿声.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工人形象 [J].平顶山师专学报, 1999(3): 8.

[18] 樊骏.论罗淑: 兼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若干轨迹 [J].齐鲁学刊, 1988(1): 16.

[作者单位: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